

# 财政分权与资源配置效率关系研究进展<sup>\*</sup>

唐未兵 伍敏敏

**内容提要:**关于财政分权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本文通过总结现有文献发现:一方面,就财政分权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究竟是积极还是消极的,学者们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另一方面,就资源配置效率视角下财政分权对宏观和微观经济的影响,学者们同样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鉴于此,学者们提出了合理划分财政事权以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构建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促进资源均衡配置、严格财政纪律以规范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行为等优化财政分权制度的相关政策建议,以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结合关于我国财政分权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分析,本文认为,今后的研究应考虑结合空间关联性分析以判断区域间是否存在空间关联特征和空间溢出效应,通过构建相应的目标函数与动态博弈理论模型,揭示财政分权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

**关键词:**财政分权 经济增长 财政支出结构 资源配置效率

## 一、引言

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属于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财政分权作为国家财政制度安排,体现的正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委托—代理关系。作为委托者的中央与受托者的地方政府“签订”财政契约合同,中央政府将部分相关的财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委托其完成部分公共财政职能。Bahl & Linn(1994)认为“财政分权是在治理,支出和收入等方面的权力下放。”Bardhan(2002)认为“财政分权是税收和支出安排的分权。”Wetzel(2001)则认为“财政分权是一种综合性体制,包括政府间责任划分体制、收支结构和转移支付体制。”财政分权实质上是财权力由上级政府向下级政府发生转移的过程,是财权利及义务在政府系统内进行分工的过程。中央政府委托给地方政府相关的财政职责,追求的目标具有多样性,诸如分配的公正性、减少信息成本、引入竞争和创新机制、社会福利最大化以及财政监督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达到帕累托最优配置状态,促进经济增长。

财政分权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财政自主权,促

使地方政府形成较强的管理本级公共事务的治理机制,从而有利于地方政府更有效地向辖区居民提供水、健康、教育和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进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Ngeni & Chalam, 2016)。Perez-Sebastian & Raveh(2015)指出财政分权激发了地区间的税收竞争,通过降低税收费用,资源丰富地区能够吸引资金和高素质人才向其集聚,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其实,关于财政分权与资源配置效率关系的探讨早在传统财政分权理论中就有相关体现。美国经济学家 Tiebout 的《公共支出的纯理论》(1956)一文解释了地方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及必要性,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原理无法解释地方政府客观存在的缺陷,为研究财政分权如何通过地方政府行为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奠定了理论基础。传统财政分权理论认为,财政分权通过“用脚投票”和“用手投票”两种机制影响资源配置效率(Porto et al, 2000)。Tiebout(1956)提出了“用脚投票”理论,以人口流动不受限制、存在大量辖区政府、各辖区政府税收体制相同、辖区间无利益外溢、不考虑各地对就业机会的限制、居民对各地公共产品收入支出模式具有完全信息、各地极力追求帕累托最优等七个假设条件为前提,

<sup>\*</sup> 唐未兵,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湖南工业大学, 邮政编码: 410006, 412007, 电子邮箱: twb62079@163.com; 伍敏敏,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邮政编码: 410006, 电子邮箱: 450723853@qq.com。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 文责自负。

认为居民基于个人的需要和偏好,将最终迁移到税收、支出效用均符合并满足自己需要和偏好的社区。为防止辖区居民往外迁徙,地方政府将致力于采取提高公共产品的配置效率、提升服务质量等措施,满足辖区居民的需要和偏好,从而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用手投票”理论则认为居民基于自己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偏好与需求行使民主选举权利,所产生的地方政府能够反映并代表其利益;地方政府根据所掌握的信息更好地履行职能,为辖区居民谋取福利,最终也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Oates,1993)。但是传统财政分权理论无法解释以下几个问题:(1)如果地方政府的官员不是由选举产生,而是由中央政府任命,地方政府则着重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而不是根据地方居民的偏好和需求做出决策。(2)如果因地方政府腐败无能、被地方财团控制等原因无法执行本应执行的决策,财政分权将导致国家宏观经济体的动荡,公共品等资源配置的无效。(3)因政治结构的差异,财政分权会减缓经济增长速度,导致通货膨胀,可能恶化地区的稳定(Bird & Vaillancourt, 1999)。基于以上质疑以及对传统财政分权理论缺陷的考量,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应运而生,它并非单刀直入地阐述如何弥补传统财政分权理论的缺陷,而是采取迂回策略,从激励视角论证财政分权的合理性及必要性。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最显著的经济效果是诱发了政府间的竞争,不仅包括资本竞争,还有劳动力要素等其他方面的竞争,由此激励了地方政府构建有效的治理结构,实现对资源的优化配置。

时至今日,财政分权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依然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有关财政分权及资源配置效率的研究已经日趋深入,学者们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了研究,取得了不少新的进展。

## 二、财政分权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理论分析

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作为有限理性的“经济人”,一方面,将基于理性意识的思考认真完成中央政府委托的任务,努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对此,Samadi et al (2013)指出财政分权在许多情况下是一个强有力的提高公共物品供给效率与公平的手段。另一方面,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地方政府将极力追求利益最大化,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异化,资源配置扭曲。Huang(2009)认为地方政府的多元目标职能决定了其行为选择往往基于总利润的最大化,并指出导致地

方政府行为异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法律规范缺失、权利义务边界模糊、地方政府财政来源有限等。总结和梳理诸多学者关于财政分权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相关文献,发现财政分权主要通过影响地方财政支出结构,进而提高或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并衍生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 (一)积极影响

财政支出结构不仅反映了政府决策的选择,还体现了政府活动的方向和范围。财政联邦主义的主要宗旨认为财政分权授予地方支出自由裁量权,有利于地方政府根据区域居民偏好调整公共利益,实现资源有效配置。Faguet(2004)基于玻利维亚的研究,发现财政分权能够激励地方政府更好地满足居民对公共人力资源和社会服务的需求。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进行了财政分权体制改革,普遍证明财政分权度的变化会对地方公共支出结构产生影响,得出财政分权有效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的结论(Grisorio & Prota,2015)。

1. 关于地方财政的硬预算约束方面。地方政府的一切活动以自身拥有的财政资源约束为限,其财政支出受财政收入的刚性约束,为此地方政府不得不按照预期的财政收入规划财政支出。Montinola et al(1995)认为财政分权实现了对地方财政的硬预算约束,使地方政府意识到财政破产的可能性,促进地方政府更好地进行公共物品配置。Martinezvasquez & McNab(2003)指出财政分权扩大了地方财政自主权,提升了地方政府创新公共物品供给方式的动力,优化了资源配置。Noor(2013)也认为财政分权有利于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以提高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的支出。

2. 强化地方财政自主权方面。地方政府对于本辖区内的财政资源应具有独立自主的支配权,除非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在某些方面涉及特殊的军事安全或重要的国家利益,否则不应受中央政府的意志左右。Fiva(2005)采用财政税收分权度衡量了18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在1979—2000年间的财政分权趋势,认为财政分权扩大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规模、改变了其构成。Malicka(2016)指出所有欧洲国家在转型阶段均实行了财政分权改革,主要目标是在提高中央政府执政水平的过程中,强化地方财政自主权,实现公共物品供给的增加以及资源的有效配置。Sow & Razafimahefa(2015)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法探讨了财政分权对公共服务供给

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其中特定的条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健康清明的政治生态环境、足够的财政分权程度和充分的财政税收权下放。

3. 促进地区间良性竞争方面。财政分权通过优化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促进地区间开展良性竞争,降低了地方政府间合谋以及竞争压力对财政支出的影响程度。Denis(1991)提出的“合谋”假说认为,地方政府间合谋对于政府支出的影响程度大小取决于中央政府对于税收权力的集中程度以及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给地方政府的共享收入。Kovariansi(2009)指出财政分权使得中央政府支持地方政府的资金有限,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不再依赖中央政府的资金支持,迫使地方政府按照当地居民的偏好进行资源配置、加大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的供给,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间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竞争。Kyriacou et al(2016)基于对23个经合组织国家的样本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在财政分权过程中,地方政府间的良性竞争将有利于降低区域收入不平等程度,缩小地区间差异。

4. 改善地方政府公共部门性能方面。许多国家在政治和经济政策改革大背景下,通过深化财政分权改革,有效并可持续地提高了其公共部门的配置效率,进而提升了经济、政治和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能力(Moges, 2013)。Arikan(2004)采用地方政府雇佣人数占整个政府雇佣人数的比重以及地方政府的层级数等非财政指标核算办法测量财政分权水平,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财政分权降低了地方政府的腐败程度,提高了地方公共部门整体性能,优化了资源配置。财政分权一方面提升了地方政府管控自身财政的能力,促使地方政府利用信息优势进行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Helmi-Gunawan, 2016);另一方面,促使地方政府更好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做出更大努力(Rodriguez-Pose & Ezcurra, 2010)。

## (二) 消极影响

不少学者认为财政分权导致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异化,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利维坦”假说认为财政分权对政府支出规模具有负面影响(Brennan & Buchanan, 1980)。Tarigan(2003)认为财政分权并不一定能够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可以肯定的是,财政分权与公共服务供给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1. 地方政府的自利意识膨胀。财政分权强化

了地方政府的自利意识,并不断趋于膨胀,致使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行为越来越趋向于自利性层面。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的自利性行为具有合理性、从属性、扩张性等特征,并带来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如“全能政府”观念难以根除、政府职能定位不尽合理、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及腐败行为蔓延等。Rodriguez-Pose et al(2009)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容易诱使地方政府以减少资本账户支出为代价提升地方经常性账户的支出水平,在经常性账户支出中谋求个人利益。对此,Badrudin(2013)通过对财政分权、资本支出、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资本支出的影响显著,资本支出对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影响并不显著。如果政府不能有效规制所属官员以公民利益为导向,政府官员会选择把资源配置于有利于自己的目标,如过分重视任期内的经济指标高低,忽视对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导致出现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城乡间公共服务供给相差悬殊、地区间公共服务极不平衡等问题(Treisman, 2006)。

2. 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显现。“中性的利维坦”假说认为政府应当既关心居民的福利又关心自身的利益(Sato, 2003)。然而,Enikolopov & Zhuravskaya(2007)认为在缺乏地方政府问责的情况下,财政分权带来的高强度经济激励反而容易诱发政府官员腐败、地方保护主义和被既得利益集团俘获等后果。财政分权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来刺激经济的本质仍然是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并未从本质上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Chen, 2009)。Siano et al(2016)通过研究财政分权对区域公共支出决策的影响发现,经济发达区域的政府部门机会主义行为更明显。

3. 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偏向效应。有学者认为完全放开地方政府支出自由裁量权容易导致其支出异质,并提出财政分权模式下的部分集权有利于地方政府更好地根据当地居民的偏好以调整公共服务支出(如中央转移支付中的专款专用部分),有力地消除了地方政府因“支出自由裁量权”而产生的资源错配(Borge et al, 2014)。此外,从动态演进的视角探讨财政分权与财政支出的偏向效应发现,在财政分权度从低到高的动态演变中,存在一个支出偏向效应的临界点,当分权度达到此点以上时,财政分权的支出偏向效应则明显减弱,且其影响的波动逐渐趋于缓和。Adam et al(2014)通过研究财政分权对公共部门效率的影响也得到了类似的观点,他们

认为财政分权与政府部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关系呈现“倒U”型。

4. 地方政府间恶性竞争。部分学者认为在资本自由流动环境下,财政分权促进了地方政府竞争,但如果缺乏相应的协调机制,很容易诱发地方政府间恶性竞争,造成公共支出在结构上的系统性“偏差”,从而导致地方公共品供给过度或不足(Keen, 1997)。Tamai(2008)指出对处于动态竞争的两个地方政府而言,分散而又缺乏平衡的人头税将引发地方政府间恶性竞争,导致地方公共物品的过度配置,影响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Egger et al(2012)研究了政府竞争对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的影响,发现如果不能有效协调地方政府的竞争,将会导致公共支出不足,对教育资源的迁移产生阻碍作用。

总体而言,财政分权降低资源配置效率的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异化,主要体现在地方与中央财政的冲突和对抗,地方政府间财政的冲突和对抗,以及地方财政与微观经济主体间的冲突和对抗等三个层面。这将导致存在大量违背中央政策和公共利益的财政支出行为,对资源配置、公共利益和政府形象都带来了负面影响。

### 三、财政分权与资源配置效率 视角下的经济运行分析

财政分权与资源配置效率如何影响经济运行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大部分学者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二者影响经济运行的机制,主流观点认为财政分权与资源配置效率不仅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还会波及微观经济的发展。

#### (一)宏观经济运行分析

由于财政分权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具有正反面性,学术界对财政分权与宏观经济增长的关系持有两种不同的理论观点。部分学者认为财政分权能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另一部分学者认为财政分权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抑制了经济增长。

1. 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正效应。Tiebout(1956)、Musgrave(1959)等人发展的第一代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和 Weingast(2006)等人发展的第二代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均认为,财政分权导致的地方政府间竞争会促进社会分工和专业化,从而激励地方政府进行制度和科技创新,提高当地的公共治理水平,优化资源配置,进而促进经济增长。而且经济增长往往被视为财政分权与提高公共部门资源配置效率的目标(Samimi

et al, 2010)。Yilmaz(2000)分别对处于发展阶段或发达阶段的单一制和联邦制等不同结构形式的30个国家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在20世纪70至80年代的单一制国家中,财政分权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度,不仅重视基础设施建设,更注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优化了资源配置,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Akai & Sakata(2002)运用财政收入指标、财政支出指标、自主性指标和加权指标等四个维度衡量财政分权水平,并通过对美国各州经济社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显著性水平为10%的情况下,支出分权提高10%,人均GDP增长率相应增加1.6%~3.2%,表明财政分权对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的美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基于时间和空间视野,Esteban-Laleona & Frutos-Madrado(2011)比较了不同学者关于公共财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结论,并对相关结论进行验证,指出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放财政权力的过程能促使各级政府努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收益水平,促进一国的经济增长。Stoilova & Patonov(2012)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六个欧盟新成员国2000—2012年间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提升了这些国家的预算绩效效率,并指出财政分权下中央与地方政府间总收入与总支出共享对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2. 具有抑制经济增长的负效应。部分学者认为财政分权会导致资源错配并抑制经济增长。转型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中央政府集中财力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可能更有利于经济增长。Enikolopov & Zhuravskaya(2007)通过对1975—2000年间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近百个国家的财政支出指标进行量化比较分析,发现对于发展中国家或者转型国家而言,财政分权抑制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Thornton(2007)以OECD成员国为研究对象,通过引入中央与地方行政分权、地方公权滥用、地方政府非理性竞争等虚拟变量研究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在复杂的经济社会环境下,资源容易产生错配,并呈现出与经济增长的负相关关系。Rodriguez-Pose & Kroijer(2009)采用动态效应方法对中东欧16个国家1990—2004年间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并没有促进地方政府在政策调整和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的创新,反而使得地方资源配置无法更好地满足当地居民的需求,抑制了经济增长。Rodriguez-Pose &

Ezcurra(2010)基于1990—2005年间的面板数据,对21个OECD成员国的财政分权与资源配置效率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后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

事实上,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Martinezvazquez & McNab, 2003)。在不同资源配置效率下,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财政分权既可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也可通过不合理的财政支出安排导致资源错配从而阻碍经济增长。

## (二)微观经济运行分析

1. 对金融市场的影响。资金是企业生产最为关键的要素之一,资金在企业间的配置效率高对金融市场的稳固及运作的有效性将产生重要影响(Kalemlı-Ozcan & Sorensen, 2012)。Banerjee & Moll(2010)认为市场失灵、政府的监管不力以及企业家的非理性投资都会导致资金配置扭曲,恶化金融市场环境。他们提出在保持企业要素边际产出相等情况下,可通过重新分配要素以优化资金配置,提升产量。Moll(2014)通过构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金融摩擦在资金配置不当的情况下对生产率的影响,认为资金配置不当造成的金融摩擦将使得生产率下降。对此,Midrigin & Xu(2014)建立动态模型研究发现,金融市场摩擦通过两个渠道降低了TFP水平,一是扭曲资金进入途径和影响技术采纳决策;二是导致生产资金和生产力的错配。金融市场摩擦不仅会扭曲现有企业之间的资本配置状况,而且会影响企业家的创业行为,导致金融市场的恶性循环(Buera et al, 2011)。Ziebarth(2013)基于密西西比州被划分为两个联邦金融储备区、遵循不同政策提供流动资金的假设、采用微观企业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由于资源错配造成信贷危机、银行倒闭,导致金融市场崩溃。

2. 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早期的资源错配文献(如Hsieh & Klenow, 2009)很少考虑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程度相对于金融市场来说偏小,更主要是出于简化问题的考虑。Palokangas(2017)以潜在劳动力和流动资本为输入变量构建了一个均衡模型,研究国家垄断劳动力市场对工人工资和福利的影响。结果发现,对于全国劳动力市场而言,如果政府放松对就业竞争的管制,则会造成工人工资和福利的错配,导致人力资源配置的扭曲;资金流动加快了劳动力对工资需求的弹性,进一步降低了工资和福利的扭曲,

提升了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外部力量的介入会增加工人的工资和福利总额,消除人力资源配置的扭曲。Micco & Repetto(2012)对1979—2007年智利劳动力错配的情况进行考察后发现,由于货币的传导政策和能源市场的冲击引发了资源错配,从而导致劳动力市场扭曲较为严重。Lim(2016)指出,因受其他国家对廉价劳动力的吸收以及韩国过度投资高技能人力资源等因素的影响,造成韩国区域劳动力市场呈现出技能高低不匹配的问题。

3. 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Guner et al(2008)考察了资源错配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他们指出,在日本和欧洲各国都存在限制大企业、鼓励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这些政策事实上人为压低了企业规模,造成了资源向生产率低的中小企业错配,并降低了TFP水平。Barseghyan & Dicesio(2009)围绕进入管制对资源错配、TFP和收入的影响进行国别考察发现,与进入管制最严的国家相比,进入管制最松的国家的TFP水平高1.32~1.45倍,而劳动生产率要高1.52~1.75倍。此外,一些国家的政府会对特定企业予以各类政策倾斜,这一方面会导致资源在截面意义上无效配置从而造成内涵型错配;另一方面也会影响企业正常的优胜劣汰,产生外延型错配。Hsieh & Klenow(2009)以所有企业的生产技术都是凸性为假设条件,认为在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状况下,生产要素在各个企业的边际产出应该相同。对此,他们基于中、美、印三国不同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边际效应产出价值分布模型进行估算发现,三国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资源错配,完全消除资源错配将使中、美、印三国产出分别增加115%、43%和127%,这证实市场扭曲引起的资源不合理配置能够解释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生产率和人均收入的差距。

## 四、优化财政分权的政策选择

### (一)合理划分财政事权,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

合理划分财政事权,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对于强化地方财政自主权,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作用。

1. 财政分权制度建设是否完善对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至关重要。Shah(2004)认为财政分权能否提高地方公共服务配置效率的关键在于分权政府自身的财政制度建设是否完善。Kapidani(2015)进一步指出,财政分权是地方政府良好运作的基本原

则,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于权利和责任的重新分配过程,对仍处于财政分权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财政分权对其经济可持续增长和资源有效配置具有重要作用。

2. 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支出责任的划分与落实是国家治理的根本问题。Gershberg(1995)指出分权总是涉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和行政决策,以及错综复杂的政府间关系。Jametti & Joanis(2010)根据一个新的政治经济模型实证分析了财政支出分权的根本原因,认为在共同支出责任下,财政分权是内生的并依赖于各级政府普遍存在的政治环境。许多发达国家的税收与支出分权不匹配,导致不对称的财政分权安排(Sacchi & Salotti, 2014)。对此, Ferreira et al(2005)认为联邦中央政府应负责宏观经济的稳定,并对收入进行再分配,提供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地方政府则主要保证辖区内居民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

3. 与政府和市场职责相匹配的财政事权划分体系。有观点认为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首先要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边界,确定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责,以更好地配置财政资源。政府应“有所为,有所不为”,重新考量政府财政活动的领域和作用界限,凡是市场能做的,政府就少介入或者不介入,凡是能通过间接手段调节的,政府就少用或者不用直接手段干预,只有当市场不能解决并需要通过公共服务才能解决时再介入,否则应由市场自己解决(Chong & Maruo, 2012)。另外,还有部分学者认为,由于政府间职能定位不清、财政事权不明、缺乏足够的财政自治权,地方政府对发展地方经济没有足够的兴趣和信心,造成了经济发展缓慢、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他们提出应突破长期以来的事权形成框架,重新设定分税变量,合理划分财政事权,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的公共支出责任,建立顺畅公平的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Su & Zhao, 2004)。

## (二)构建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促进资源均衡配置

财政转移支付是促进资源公平配置、区域间均衡发展的主要做法,具有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Bird & Smart(2002)认为要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应要求转移支付的接受者必须具备足够的财力和灵活的决策制定能力。另外需将转移支付具体化,可分为总目标补助和特定目标补助。

1. 关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构建方面。主流观点认为构建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应当充分考虑

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纵向财政协调性,以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Sanguinetti & Tommasi(2003)基于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两种假设,构建了相关模型讨论如何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他们提出了两种制度:一是中央政府事先对每个地区承担一定水平的转移支付;二是让地方政府影响联邦政府以获得转移支付。Brueckner(2009)提出了“部分分权模式”,即中央政府将财政支出权下放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收入则依靠中央政府转移支付,中央政府先征收人头税,再将所得收入以转移支付方式给地方政府。

2. 关于财政转移支付优化资源配置、均衡地区发展方面。大部分学者认为,财政转移支付促进了资源在地区间的均衡配置,有效解决了环保和贫困问题,对地区间的公平发展具有推动作用。Checherita et al(2009)以家庭主要收入和可支配收入为指标构建相关收敛模型,采用1995—2005年19个欧盟成员国样本数据分析财政转移支付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转移支付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减少地区收入差距,实现区域间均衡发展。Bjornestad(2009)深入分析了财政分权与扶贫效果的关系,认为有针对性地增加可用于资助贫困的财政资金将有助于减少贫困的发生。然而,提高财政支出水平并不能确保财政转移支付有效地花费在解决贫困的问题上,为此,政府应将更多的财政权力和行政资源下放给区级等基层政府。

3. 关于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方面。部分发达国家关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改革有效促进了公共服务均等化。Ye et al(2009)认为,日本的财政转移支付不仅能为生产者提供更高、更稳定的收入来源,而且还能激励生产者扩大再生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Evers(2012)指出,财政转移促进了资金在欧盟成员国之间的重新配置,抵消了不利因素的冲击。Duan & Zhou(2015)认为,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了地区间公平均衡协调发展,应加大转移支出占公共资源支出的比例,不断提升专项补助水平;还需稳步撤销税收返还制度,构建更加合理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建立规范化的专项转移支付标准。

## (三)严格财政纪律,规范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行为

在分税制国家中,地方政府在地方创收中所占的比重通常被认为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这也同时激励地方政府官员在经济发展活动中极力

追求个人经济利益,加重了地方经济负担,导致财政支出结构扭曲和资源的不合理配置(Treisman, 2006)。对此,大部分学者提出应建立健全严格的财政纪律制度,规范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减少地方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

1. 严格履行财政职能。财政分权能否遏制腐败、规范地方政府支出行为需要以政府严格履行财政职能为前提条件。Martinezvasquez & McNab (2003)指出财政分权导致规模庞大的多层级联邦政府财政监督力量的分散,使得联邦政府比单一政府更加腐败。对此,他们认为各级政府应当严格履行相关的财政职能,遏制腐败的滋生。Altunbas & Thornton(2012)通过对64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财政分权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发现当国家采取垂直行政分权机制时,财政分权对抑制腐败、规范地方政府支出行为具有正效应,并认为在高度法治国家中,各级政府依法全面履行财政职能将极大减少腐败的发生。Oto-Peralias et al(2013)基于对31个OECD国家在1986—2010年间的数据进行研究后认为,在一个相对腐败的国家,如果地方政府更接近辖区居民,并有严格的财政纪律保证,则能促使地方政府更好地履行财政职能,减少因腐败造成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异化及公共财政赤字的负面影响。

2. 强化对财政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完善财政权力运行流程,建立监督检查机制,切实把财政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Crivelli(2012)指出除非具有严格的财政纪律等约束措施,否则财政分权会导致财政失衡加剧。规范地方政府支出行为需要构建完善的监督机制以约束地方政府的资源配置权力,引导地方政府良性竞争,压缩地方官员寻租腐败的空间,提高官员自律的内在动力(Maiga et al, 2016)。Shen(2014)认为中央政府应当制定竞争管理机制,激励地方政府进行良性竞争。另外,需建立监督机制,加强对地方财政权力的制约,采取严厉、有效的监督行为,防止地方政府间恶性竞争,规范地方政府支出行为。

3. 加大行政问责力度。对于违反财政纪律的行为,中央政府应当做到严厉查处,绝不姑息,切实增强地方政府官员对财政纪律的敬畏和遵守。在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财政分权增加了地方政府官员寻租行为的可能性,人民必须通过贿赂得到他们已经支付了税收的公共服务(Prud-Homme, 2003)。Asatryan et al(2015)指出中央政府应制定债务规

则以惩戒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纠正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扭曲问题。Akin et al(2016)通过构建数量模型,并引入与收入补偿转移机制和惩罚机制相结合的变量,分析了财政分权与财政纪律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经济私有化程度越高的地方,财政分权与财政纪律问题越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因此应加大惩罚力度,遏制可能发生的财政纪律问题。

## 五、中国式财政分权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分析

中国分别于1985年和1994年进行了契约性财政分权改革和分税制财政分权改革,地方政府在财政分权改革后获得了一定的财政自治权,同时也承担起了地方公共品供给和资源配置的责任(Guil et al, 2009)。对于中国式财政分权如何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及其相关效应,学者们持有不同的观点。

### (一)激励地方政府不断优化财政支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分税制改革是一种介于财政分权和集权之间的平衡机制,能有效规避各级政府之间在财权与事权划分中出现的“缺位”和“越位”现象,显著提高资源配置效率(Lin & Liu, 2000)。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地方政府行为是在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体制架构下运行的。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被赋予了更多的角色,在地方事务管理中承担了更多责任,可以激励地方政府不断优化财政支出(Guil et al, 2009)。有学者指出,分税制改革并未破坏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机制,通过硬化地方企业的预算约束(Qian & Roland, 1996),反而有利于提升地方企业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引致高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Chu & Zheng(2013)运用卢卡斯的内生增长理论和斯蒂格利茨的地方公共物品理论构建了五个联立方程,采用1996—2005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财政分权促使地方政府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和教育等方面的支出,提高了局部物质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源水平,优化了资源配置,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

### (二)诱发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异化,抑制资源配置效率提升

诸多研究中国财政支出结构与资源配置效率关系的专家认为,“晋升锦标赛”引起地方政府通过倾向性的财政支出政策作用于经济增长,但也加剧了

资源配置的扭曲程度(Demurger, 2001)。早期中国财政体制表现为高度集权的典型特征,资源的计划性配置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统收统支”的局面使得地方政府缺乏推动经济增长的内在激励。虽然随后以“财政包干”为具体表现的体制改革显著推动了经济增长,但未能遏止中央政府财政收入逐年递减的态势(Shen et al, 2006)。原因在于地方政府通过将部分预算内财政收入转移到预算外,降低了向中央政府缴纳税收的额度(Chargari et al, 2011)。Huang(2011)认为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激励措施诱导地方政府强调财政收入和经济增长,导致地方政府采取“铤而走险”的机会主义行为,造成在基础设施上投入过多,对基本公共品投入过少。Boyreau-Debray et al(2003)认为中国市场存在严重的地方分割现象,使得资本配置偏离了向生产率更高地区流动的原则。Enru(2010)考察了改革时期中国财政制度的演变,以及此阶段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相应变化情况,重点分析了不同地理区域政府间恶性竞争引发的财政支出差异,认为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差异导致了区域间资源配置不均衡,造成了中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

## 六、总结

学者们基于不同角度,使用不同方法对财政分权如何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及其经济效应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优化财政分权、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相关政策建议。通过系统梳理和归纳现有文献发现,多数文献尚未探明财政分权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内在机理,针对宏观和微观经济运行分析的正反两种观点也未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鉴于此,为了考察我国财政分权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学者应深入总结当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紧密结合我国国情,为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指明研究方向。

首先,尽管学术界关于财政分权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但目前学者关于财政分权对资源配置效率具有积极还是消极影响的观点并不统一。另外,对相关文献分析发现,鲜有文献能解释清楚财政分权影响资源错配的具体作用渠道。对于我国而言,研究应从财政体制历史变迁的视角切入,探讨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中央与地方政府在财权和事权分配方面存在的协调与矛盾特征,进而从中央与地方政府公共品供给偏好的视

角解读财政集权与财政分权的关系,构建相应的目标函数与动态博弈理论模型,揭示财政分权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

其次,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财政分权到底是优化资源配置进而促进经济增长,还是降低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抑制经济增长,目前学术界的观点并不一致。其主要原因是学者们基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计量指标和测算方法,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另外,各国财政制度、政策国情等因素的不同也会对结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作为发展中国家,倘若要理顺我国关于财政分权影响经济增长的逻辑脉络,就有必要针对中国数十年的财政体制变迁进程和历史节点进行系统回顾,通过针对不同时期的分权与集权特征及其产生原因展开深入分析,找到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存在正负效应特征的历史和现实根源。

再次,当前多数实证研究基于州(省)级面板数据和传统计量方法展开,基于州(省)以下的地方政府数据的实证分析至今依然少见。对于我国这种典型的非均质大国而言,不同区域之间还存在着空间异质性和空间依赖性特征。后续的学术研究应考虑结合空间关联性,分析判断区域间是否存在空间关联特征和空间溢出效应,进而合理地选择空间权重矩阵,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结合市县数据和微观企业数据深入探讨财政分权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

最后,关于优化财政分权,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相关政策研究,学者们提出了很多可供参考的理论观点。我国正处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构建现代财政制度的新阶段,应当借鉴国外有益的财政分权实践,加强法治财政建设,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构建高效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严肃财经纪律,从宪法和法律层面制定财政分权的整体框架,充分发挥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

## 参考文献:

- Adam, A. et al(2014),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public sector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OECD countries”, *Economics of Governance* 15(1):17-49.
- Akai, N. & M. Sakata(2002),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contributes to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state-level cross-section data for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52(1):93-108.
- Akin, Z. et al(2016), “Doe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promote fiscal discipline?”,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 Trade 52(3):690–705.
- Altunbas, Y. & J. Thornton(2012),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governance”, *Public Finance Review* 40(1):66–85.
- Arikan, G. (2004),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 remedy for corruption?”,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 11(2):175–195.
- Asatryan, Z. et al(2015), “Partial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sub-national government fiscal disciplin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OECD countries”, *Public Choice* 163(3):307–320.
- Badrudin, R. (2013), “Effec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capital, expenditure, growth, and welfare”, *Economic Journal of Emerging Markets* 3(3):211–223.
- Bahl, R. & J. Linn(1994),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intergovernmental transfers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Acoustics Speech & Signal Processing Newsletter, IEEE* 24(1):1–20.
- Banerjee, A. V. & B. Moll(2010), “Why does misallocation persist?”,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1):189–206.
- Bardhan, P. (2002), “Decentralization of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6(4):185–205.
- Barseghyan, L. & R. DiCecio(2009), “Entry costs, misallocation, and cross-country income and TFP difference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Working Paper No. 5.
- Bird, R. M. & F. Vaillancourt(1999),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ird, R. M. & M. Smart(2002), “Intergovernmental transfers: International lesson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Development* 30(6):899–912.
- Bjornestad, L. (2009),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fiscal incentives and pro-poor outcomes: Evidence from Viet Nam”, Asian Development Bank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No. 168.
- Borge, L. E. et al(2014), “Partial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demand responsiveness of the local public sector: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Norway”,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80(1):153–163.
- Boyreau-Debray, G. et al(2003),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growth: Chinese style”,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0(2):1–46.
- Brennan, H. G. & J. M. Buchanan(1980), *The Power to Tax: Analytical Foundations of A Fiscal Constit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rueckner, J. K. (2009), “Partial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Regional Science & Urban Economics* 39(1):23–32.
- Buera, F. J. et al(2011),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A tale of two sector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4914.
- Chargari, C. et al(2011), “Local governments tax effort in China: An analysis of provincial tax performance”, CE-MA Working Papers 29(2):203–236.
- Checherita, C. et al(2009), “The role of fiscal transfers for regional economic convergence in Europe”, Europe Central Bank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1029.
- Chen, S. (2009), “Tax reform,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local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China”,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No. 51.
- Chong, F. S. & N. Maruo(2012), “Market mechanism, optimum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Shobi Journal of Policy Studies, Shobi University* 14:1–27.
- Chu, J. & X. P. Zheng(2013), “China’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Japanese Economic Review* 64(4):537–549.
- Crivelli, E. (2012), “Local governments’ fiscal balance and privatization in transition countries”,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20(4):677–703.
- Demurger, S. (2001),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An explanation for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9(1):95–117.
- Denis, P. T. (1991), “Market power in antitrust merger analysis: Refining the collusion hypothesis”, *Antitrust Law Journal* 60(3):829–837.
- Duan, D. & J. Zhou(2015), “Research on the system of fiscal transfer pay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Sports Education, pp. 2220–2223.
- Egger, H. et al(2012), “Brain drain, fiscal competition, and public education expenditur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81–94.
- Enikolopov, R. & E. Zhuravskaya(2007), “Decentralization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1(11–12):2261–2290.
- Enru, W. (2010),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revenue/expenditure disparities in China”,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51(6):744–766.
- Esteban-Laleona, S. & P. D. Frutos-Madrado(2011), “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Economia, Sociedad Y Territorio* 36(4):349–381.
- Evers, M. P. (2012), “Federal fiscal transfer rules in monetary union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56(3):507–525.
- Faguet, J. P. (2004), “Does decentralization increase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to local needs? Evidence from Bolivi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8(3–4):867–893.
- Ferreira, S. G. et al(2005), “Inter-jurisdictional fiscal competition: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Brazi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5(3):295–313.

- Fiva, J. H. (2005), "New evidence o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the size of government", CESifo Working Paper No. 1615.
- Gershberg, A. I. (1995),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An analysis of federal versus state education finance in Mexico", *Review of Urban & Regional Development Studies* 7(2):119—142.
- Grisorio, M. J. & F. Prota(2015), "The short and the long run relationship betwee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public expenditure composition in Italy", *Economics Letters* 130(3):113—116.
- Guil, N. et al(2009),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urban-rural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4(3):909—915.
- Guner, N. et al(2008), "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size-dependent policies",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11(4):721—744.
- Helmi-Gunawan, A. (2016), "The influence of general budget to regional own revenue with capital expenditure as an intervening variable", Skripsi University.
- Hsieh, C. T. & P. J. Klenow (2009), "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 Munich Personal RePEc Archive Paper No. 35084.
- Huang, G. (2011), "Notice of retractio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local government behavior, and unbalanced development: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Business and E-Government pp. 1—5.
- Huang, J. (2009),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unruly behavior of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Proceedings of 200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ublic Administration(5th), Vol. 1, 484—490.
- Jametti, M. & M. Joanis(2010), "Determinants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Political economy aspects", Barcelona Institute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s No. 7.
- Kalemliozcan, S. & B. E. Sorensen (2012), "Misallocation, property rights, and access to finance: Evidence from within and across Africa", NBER Working Paper No. 18030.
- Kapidani, M. (2015),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 Albania: Effects of territorial and administrative reform", *Scientific Bulletin-Economic Sciences* 14:29—36.
- Keen, M. (1997), "Fiscal competition and the pattern of public spending",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66(1):33—53.
- Kovariansi, V. A. (2009), "The impacts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cities", Regional and City Planning Studies No. 11.
- Kyriacou, A. P. et al(2016), "Regional inequalitie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government quality", *Regional Studies* 54(4):1—13.
- Lim, L. (2016), "Labor market distortion with discouraged worker effects in Korea", in: E. Kim & B. H. S. Kim (eds), *Quantitative Region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Analysis for Sustainability in Korea*, Springer.
- Lin, J. Y. & Z. Liu(2000),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9(1):1—21.
- Maiga, S. et al(2016),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territorial competition, and corrup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Invention* 3(4):2039—2047.
- Martinez-vazquez, J. & R. M. McNab(2003),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World Development* 31(9):1597—1616.
- Micco, A. & A. Repetto(2012), "Productivity, misallocation and the labor market", University of Adolfo Ibanez Working Paper No. 6.
- Midrigin, V. & D. Xu(2014), "Finance and misallocation: Evidence from plant-level dat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4(2):422—458.
- Moges, A. G. (2013),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reform in Japan: Approach, policy and practical challeng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32(1):23—46.
- Moll, B. (2014), "Productivity losses from financial frictions: Can self-financing undo capital misalloc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4(10):3186—3221.
- Montinola, G., Y. Y. Qian & B. R. Weingast(1995),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48(1):50—81.
- Ngeni, F. B. & G. V. Chalam (2016),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autonomy in Tanzanian local government authorities: A review of existing literature and empirical evidence", *European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8(28):28—36.
- Noor, D. Z. (2013), "The effec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economic growth (A case study of Kudus regency)", Universitas Gadjah Mada.
- Oates, W. (1993),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National Tax Journal* 46(2):237—243.
- Oto-Peralias, D. et al(2013), "Doe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mitigate the adverse effects of corruption on public deficit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2:205—231.
- Palokangas, T. K. (2017), "Labor market regulati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ootloose capital",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10468.
- Perez-Sebastian, F. & O. Raveh (2015), "The natural resource curse and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xford Centre for the Analysis of Resource Rich Economies Research Paper No. 112.

- Porto, A. & N. Porto (2000),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voters' choices as control",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ics* 3(1):135—167.
- Prud-Homme, R. (2003),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 Africa: A framework for considering reform",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 23(1):17—27.
- Qian, Y. & G. Roland (1996),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in China", *Japan & the World Economy* 8(2):207—223.
- Rodriguez-Pose, A. & A. Kroijer (2009).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Growth and Change* 40(3):387—417.
- Rodriguez-Pose, A. & R. Ezcurra (2010), "I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harmful for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the OECD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11(4):619—643.
- Rodriguez-Pose, A. et al (2009),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efficiency and growth",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41:2041—2062.
- Sacchi, A. & S. Salotti (2014), "The asymmetric nature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Munich Personal RePEc Archive Paper No. 54506.
- Samadi, A. H. et al (2013), "The effec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under-five mortality in Iran: A panel data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Policy & Management* 1(4):301—306.
- Samimi, A. J. et al (2010),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Iran", *Australian Journal of Basic & Applied Sciences* 4(11):5490—5495.
- Sanguinetti, P. & M. Tommasi (2003), "Intergovernmental transfers and fiscal behavior: Insurance versus aggregate disciplin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 62(1):149—170.
- Sato, M. (2003), "Tax competition, rent-seeking and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7 (1):19—40.
- Shah, A. (2004),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economies: Progress, problems and the promis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3282.
- Shen, A. C et al (2006),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 China: History, impact, challenges and next steps", *Annals of Economics & Finance* 13(1):1—51.
- Shen, L. F. (2014), "Review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Applied Mechanics & Materials* 687—691:4553—4555.
- Siano, R. D. & M. D'Uva (2016),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spillover effects of local government public spending: The case of Italy", *Regional Studies* 54(5):1—11.
- Sow, M. & I. F. Razafimahefa (2015),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the efficiency of public service delivery", IMF Working Paper, No. 59.
- Stoilova, D. & N. Patonov (2012),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s it a good choice for the small new member states of the EU?", *Annals of the Alexandru Ioan Cuza University Economics* 59(1):125—137.
- Su, M. & Q. Zhao (2004), "China'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reform",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 Asia Revisited, pp. 1—13.
- Tamai, T. (2008), "A note on the dynamic analysis of fiscal competition", *Urban Studies* 45(3):651—657.
- Thornton, J. (2007),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reconsidered",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61 (1): 64—70.
- Tiebout, C. M. (1956),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4(5):416—424.
- Treisman, D. (2006),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A reconsideration", *Economics & Politics* 18(2):219—235.
- Weingast, B. R. (2006), "Second generation fiscal federalism: Implications for decentralized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65(3):279—293.
- Wetzel, D. (2001), *Decentralization in the Transition Economies: Challenges and the Road Ahead*,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Ye, T. et al (2009), "Inter-sectoral allocation of disaster risk: Is inter-sectoral fiscal transfer creating the right incentives?", *Kyoto University Disaster Prevention Research Institute Annuals* 52(B):207—216.
- Yilmaz, S. (2000), "The impac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Proceedings, Annual Conference on Taxation and Minutes of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Tax Association, 92:251—260.
- Ziebarth, N. L. (2013), "Identifying the effects of bank failures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in Mississippi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5(1):81—101.

(责任编辑:刘新波)

(校对:刘洪愧)